



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 认知转变及其价值意蕴

段成名 李银兵 文婧

摘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密切相关。在这种认知转变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中间阶级”的农民阶级一跃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得到正式确认,作用随之得以最大彰显。而毛泽东对农民阶级属性和地位的这种认定,不仅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也拉开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幕。时至今日,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对新时代“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实践,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阶级;认知转变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4.003

收稿日期:2021-1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多彩贵州’传统节日文化品牌的构建与传播研究”(20GZZD3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成名,男,四川万源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43021443@qq.com;
李银兵,男,四川资中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婧,女,四川资阳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转变开辟了工人阶级联合和领导农民阶级进行革命的新道路,为解决和研究“三农”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目前,学界对毛泽东农民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理论层面上,莫里斯·迈斯纳、布兰特利·沃马克、胡绳、金冲及、王立胜、温铁军等学者分别论析了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相关论题^②;军利、王新华、苗国强、张为波、王玉顺、邓世平、吕彦瑶等学者将毛泽东农民思想同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

①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②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7页;[美]布兰特利·沃马克《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都静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23—34页;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4—19页;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42页。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第46—52页;温铁军《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学习月刊》2007年第1期,第17—18页。

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①。在实践层面上,肖贵清、钱守云、沈文慧、单孝虹、罗恢远、董石桃、蒲丽娟等学者对毛泽东如何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调动农民主体能动性以及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进行了深入探讨^②;贾钢涛、李强、马中全、尹小平、陈俊、陈国泳等学者则立足于教育与农民关系,从为什么做、如何做以及做的教育意义等方面入手对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③。总的来说,前期学者在毛泽东农民思想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认知这一主题的研究而言,尽管解伟、冯肖贞、陈洪玲、蒋琴、谢凤华等学者的研究已经有所涉及^④,但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的问题尚存,因而当前学界亟需加强毛泽东对农民及农民阶级认识的转变、深化与拓展等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认知的“转变过程”、“转变缘由”以及“转变意义”三个方面,对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及其背后潜藏的价值意蕴进行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认知转变的过程

农民阶级是指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且主要从事农业劳作的阶级。在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中,基于农民阶级的性质和地位的不同,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就大不一样,因而各国的理论家对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也就千差万别。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创者,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他对农民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知而言,总体上呈现出了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一)农民阶级是社会“中间阶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阶级认知体系中,欧洲的农民阶级是政治态度保守甚至反动的中间阶级。他们的这种判断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欧洲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和闭塞的生活致使农民对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依赖,所以他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为了维护他们中间阶级的生存,“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⑤;第二,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助长了反动阶级的统治,而“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⑥。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由于这种保守和短视,使得农民阶级在革命的社会中只能处于中间的摇摆状态,甚至反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地发展,马克思也逐渐认识到,当“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⑦,必

①参见:军利、王新华《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农”思想的差异》,《求实》2005年第2期,第11—13页;苗国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理论月刊》2010年8期,第30—34页;张为波《邓小平农民教育思想与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第28—30页;王玉顺《毛泽东与彭湃农民运动思想之比较》,《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76—81页;邓世平《〈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与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理想》,《毛泽东研究》2017年第2期,第53—58页;吕彦瑶、周新辉《习近平与毛泽东农民思想比较研究》,《延边党校学报》2017年第5期,第17—19页。

②参见:肖贵清、王力《试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的思想》,《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1期,第37—39页;钱守云《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沈文慧《赋予农民文化权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诉求》,《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5期,第27—31页;单孝虹《毛泽东关于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初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4期,第17—22页;罗恢远《延安时期毛泽东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88—91页;董石桃《论毛泽东农民政治参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2期,第1—6页;蒲丽娟、王伟《毛泽东农民养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理论导刊》2010年第3期,第8—10页。

③参见:贾钢涛《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6期,第38—44页;李强、马中全《论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对培养新型农民的指导意义》,《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90—92页;尹小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的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国泳、李琦《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第43—48页。

④参见:解伟、冯肖贞《毛泽东农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6页;陈洪玲、蒋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及当代价值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3期,第41—48页;谢凤华、岳欣《毛泽东农民思想探析》,《农业经济》2013年第2期,第58—59页。

⑤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⑥弗·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⑦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页。

然使得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尤其是小农,会沦为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①小农和工人同样作为无产者就必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就有可能组成工农联盟。而对于工农联盟思想,在马克思剖析 1848 年欧洲革命时的著作中就可以窥探一二^②。后来,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工农联盟思想,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③,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希望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结合的产物。

从 1848 年法国农民起义后,农民“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④。因此,在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革命发表意见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争取多数的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议会选举时,一定要取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最终且持久的胜利^⑤。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认知上的这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巴枯宁等人认为,“普通农民,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⑥。后来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想法一直不是正面的”^⑦。诚然,立足于欧洲社会现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对农民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的重视程度确实远不及工人无产阶级,并且这种重视仅仅表现为理论层面的,并没有大范围付诸实践。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农民阶级作为“中间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而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性来看,由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基因培育出来的中国农民,在阶级性上与欧洲农民本应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介绍、翻译到中国,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影响是最大的^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时中国的理论界并没有条件全面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那时多数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农民阶级思想影响下,也顺理成章地将农民阶级视作保守的中间阶级,所以他们不会去,也不愿去做农民工作。其中,毛泽东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代表。在 1920 年春,毛泽东“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⑨。同年冬天,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⑩。后来,他在 1925 年 11 月填写过一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而在其中的“入会后的事业”一栏中他如是写道:“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⑪所以在革命早期,毛泽东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天生就会做农村工作和农民运动,因为“他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村的一切有亲身感受,为日后从事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⑫。的确,从小在农村中一个比较特殊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对农村和农民有一些感性认识——在他看来,农民是很勤劳朴实但也十分可怜。他从他父亲发家的经历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劳动而过上可以靠收租过日子的生活,但现实中绝

①弗·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513 页。

②《第一卷说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3 版,第 8 页。

③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1 页。

④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116 页。

⑤弗·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550 页。

⑥卡·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3 页。

⑦何丽野《马克思在农民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及其意义——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删节说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78 页。

⑧胡永钦、狄睿勤、袁延恒《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0 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 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自述》,第 39 页。

⑪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509 页。

⑫庄福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第 6 页。

大多数穷苦的农民必须靠租种别人的土地来维生,也并没有太多的农民只靠勤劳就能致富。再加上毛泽东受他母亲的影响——尽管他家里对于是否应该同情、施舍穷人存在相悖的意见,但据他自己说,他是和其母亲站在一起的——他从小就对那些生活较为可怜的农民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同情^①。在毛泽东开始读书识字后,尤其是当读到一些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他就注意到,为什么“没有农民当主角”^②。但后来,当农民遇到天灾而不得不抢粮商的粮食以救命时,他却又不是很赞同这种江湖式的做法了。从这一矛盾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民的关注是顺其自然的。但那时的他对农民的认知是偏感性而非理性,他没想过农民这一最普通的阶级会成为推动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因此,对于那时的毛泽东而言,虽然“农民问题在他脑子里,是从小以来就没有一刻放松过的”^③,但他主要还是一位“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④的工人运动领袖。

(二)农民阶级是“关键多数”的群体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中,工人无产阶级才是推动革命的主要力量。当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并支援了学生爱国运动,他们进行的大规模罢工迫使反动政府停止了对学生的迫害,撤销了卖国官员的职务。这让不少先进人士看到了推动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也同样存在^⑤。于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领导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因此而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了。以毛泽东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为例,1921年12月,毛泽东到安源煤矿考察,他“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的痛苦和受压迫的情形,随后,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⑥。1922年9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安源煤矿工人进行了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当然,那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多是以争取经济上的利益为目的的。1923年2月,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国内第一次工人运动达到了顶点,但遗憾的是,在北洋军阀的武力镇压下,此次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后来,毛泽东在对工人运动失败的反思中,深深地注意到了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悬殊,以及一味地领导开展工人运动而不重视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局限。正如张国焘在回忆中共三大召开时的情景时写道:“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⑦尽管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⑧,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农运不感兴趣’。陈独秀甚至‘还反对农民运动’。张国焘也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当然,这是一个整体性认识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也在形成之中”^⑨。

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让中国展现出了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农民阶级始终是社会中最主要且数量最多的阶级。后来,毛泽东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又注意到,“在五卅运动中,上海与广东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未得到农民的支持而陷入孤军奋战;省港大罢工中广东工人阶级的斗争,因得到农民的支持而长期坚持下来”^⑩。可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萌生了“工人是重要少数,农民是关键多数”的思想。因为在那时,农民虽然“保守”,其人数却占到社会总人口的80%以上;工人尽管“先进”,其人数却只占社会总人口的不到5%。并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的工人主要是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不是由城邦手工业者转变来的产业工人。所以,面对当时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事实,毛泽东进一步地去思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引导农民阶级参加革命等问题。综上,则是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

①毛泽东《毛泽东自述》,第6—7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自述》,第10页。

③萧三编述《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年版,第65页。

④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⑤黎澍《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第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1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12页。

⑨欧阳湘、罗玲《毛泽东在广州》,人民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⑩欧阳湘、罗玲《毛泽东在广州》,第108页。

认知转变的现实基础。也就是在对工人运动失败结局的反思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后,提出了依靠农民来进行社会革命这一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观点。

(三)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天然同盟军”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观察当时兴起的农民运动,对农民阶级的认知有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1925年,回湖南养病的毛泽东在当地作了一些调查后,对农民的革命性有了全新认识。在调查过程中,为了批判当时党内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重视工人运动而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重视同国民党合作,并认为农民落后、保守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1925年5月,毛泽东到湖南安化县调查时就鼓励当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组织秘密农协、发动农民,要进行维护农民利益的斗争^①。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因此,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的“入会后的学业”一栏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填写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②

1925年12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文章成为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之一。首先,毛泽东不仅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半自耕农和贫农的问题,而且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其次,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进行系统阐述,明确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团结的对象和打击的对象,阐明了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再次,毛泽东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初步形成了关于正确认识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的思想理论。因此,毛泽东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③。但由于当时党内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希望能在党的刊物中发表该文的请求也就被陈独秀拒绝了。在1926年5月后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在主办广州农民讲习所以及参与领导全国农民运动^④。总之,经过对大量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从实践经验不断上升到了理论概括,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⑤由此可见,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将其工作重心以及对革命的期望彻底转向了领导农民运动以及工农联盟上。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受到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巨大声势感染,认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从自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得到启发,发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⑥。在不断地对实践经验总结后,毛泽东得出:中国的农民不是反动的,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农民不会反对公有制以阻碍社会发展,反而会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⑦总之,从重视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到认识到农民阶级是“关键多数”,再到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正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的这个认知转变,是对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集中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至此,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思想已基本形成。

二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认知转变的缘由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30页。

②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09页。

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页。

④欧阳湘、罗玲《毛泽东在广州》,第57页。

⑤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⑥〔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自述》,第44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①从消极的“中间阶级”到积极的“天然同盟军”，毛泽东在不断的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经验总结过程中完成了对农民阶级认知的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够产生，源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主动地、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而言，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认知转变的缘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形势反思的结果

针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更加激烈”^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些不太切合具体实际、自相矛盾和难以执行的革命策略。例如，在1922年7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道：“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③但仅仅4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却又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去领导农村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斗争。”^④总的说来，“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形成对革命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状况的基本认识，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建党的模板”^⑤，而教条式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也让中国革命走了不少的弯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所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试图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领导和依靠工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比较成功，“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⑥。但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到达顶点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反革命的武装镇压下失败的事实，让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虽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他们的人数很少，单单依靠这一种社会力量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在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遭遇挫折和失败的事实面前，不断地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总结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地认识到了在中国只重视工人阶级的局限性，明确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正如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⑦事实证明，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照搬照抄别国革命经验是行不通的。考虑到当时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状况，毛泽东坚持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必须要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出，然后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攻。正是源于这种判断与坚持，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产物

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过程中完成了对农民阶级属性的认知转变一样，毛泽东也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亲身实践以及对实践经验总结中完成了对中国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1924年1月，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团举行全体会议时，毛泽东在对农民的革命性发表意见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湖南省长沙、浙江省杭州、湖南省衡山、广东省惠州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这些地方我们起先组织不识字的农民，然后领导他们同较富裕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未认识到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

①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74页。

③《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日），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④《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纲领草案》（1922年11月30日），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第206页。

⑤李亚男、王久高《国民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认识的历史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4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册，第85页。

⑦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157页。

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任何不幸。”^①此时的毛泽东对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看法仍是相对保守甚至消极的,但这样的判断也是符合当时党内外的客观实际,特别是农民阶级面对物质利益时所展示出的短视性,是毛泽东产生这样想法的主要依据。

1925年2月,毛泽东同韶山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在当地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通过教农民学认字、学珠算、学政治,进行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②。同年8月,毛泽东在韶山领导遭受天灾的农民开展了“平巢阻禁”谷米斗争,迫使当地土豪平价将粮食卖给农民。期间,韶山周边各乡各村的农民也进行了同样的斗争,均取得了胜利^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革命中看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以及农民的阶级斗争剧烈性。1926年6月初,毛泽东开始为第六届农讲所的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④。

在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任职期间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民党就确定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就有了对农民运动的具体议案:“本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基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⑤1926年1月16日,毛泽东同汪精卫等人在起草《关于宣传决议案》时指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⑥同年1月18日,毛泽东同丁君羊、侯绍裘等代表受到国民党二大主席团指定,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更加强调农民的作用。他们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⑦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继续不断地强调重视农民阶级的必要性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927年5月31日,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的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⑧同年9月,毛泽东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广东湖南江西各地的农民运动,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⑨同年底,应邀出席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⑩。

通过对一系列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十分具有革命性。他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⑪此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而且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⑫总之,就是在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教育的实践经验总结中,毛泽东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是其他阶级无法替代的。

① 欧阳湘、罗玲《毛泽东在广州》,第38页。

② 卢国琪《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群体教育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3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63页。

⑤ 《全国农民运动概观》,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50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51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98页。

⑨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73页。

⑪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

⑫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页。

(三)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理论认识深化的成果

对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当时的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陈独秀与邓中夏之间的争论。陈独秀认为农民阶级不是中国革命的革命力量。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①。同年12月,他又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认为中国农民人数多,自然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②。但是,作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邓中夏却较早地看到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当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他当即发文驳斥了其对于农民革命性的低估。他说:“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③因此,党内陈独秀与邓中夏关于农民革命性认识的争论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同志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党内农民问题的辩论和思想交锋,毛泽东在大城市一边认真做着宣传工作,一边积极调查研究广东、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以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1925年2月,毛泽东在韶山一边搞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一边研究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他在韶山建立了党支部,组织农民协会,对农民进行革命教育。这次在韶山做农运的经历让毛泽东看到了当地农民的革命性。同年9月,毛泽东在回广州的途中会见了中国共产党宜章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高静山,一起“谈对湖南农村阶级状况的看法,并征询高的意见”^④。经过亲身实践,此时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多数成员的认识已有所不同。他回到广州后就“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⑤。不久后,毛泽东就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不仅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以及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也是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对农民阶级和阶层认知在理论层面上的深化表现。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等5个地区的农民运动,最终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农民长期遭受自然因素的约束,近代后又遭到政治的压迫,所以“两半社会”里的农民是很有革命意愿的。他高度评价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正确分析了农民阶级中各个阶层的政治态度,充分肯定了贫农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并初步阐述了农民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的光辉著作,奠定了毛泽东农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优良工作作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形成的逻辑起点。

总之,从对现实的反思到对实践的总结,再到理论的深化,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成了对农民阶级认知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为中国革命新篇章的开启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探寻到了一个新的阶级力量和革命动力。

三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认知转变的价值意蕴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⑥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举行了湘

①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1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2页。

②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7页。

③邓中夏《论农民运动》(1923年12月29日),《邓中夏全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35页。

⑤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第123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赣边秋收起义,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明道路,中国革命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高潮。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到这条伟大的革命道路,主要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农民阶级的深刻认知、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深化以及对中国社会洞悉的深入密切相关。时至今日,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认知转变的价值意蕴对新时代“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实践,还提供着诸多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探索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列宁于1902年正式地提出了划分社会阶级的标准,即“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②。毛泽东在分析一个拥有数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时,将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的运用同中国具体的实际进行了有效结合^③。他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五种,从属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十二个阶层”^④,这种阶级分析范式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⑤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没有现成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将中国伟大的社会革命推向前进,必须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事实判断置于价值判断之前是毛泽东进行农村研究的前提。经过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寻乌调查为主的一系列调研后,毛泽东已经将调查研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⑥毛泽东强调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既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的伟大创新。在后来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中,毛泽东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这些思想环环相扣,一步步地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总之,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阶级认知的集体智慧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转变,使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最终克服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⑦。这一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自己不是教义,而是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特别强调只有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才能解决实际问题。”^⑧历史证明,只要将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丰实了革命的依靠力量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主动翻译马列主义、俄国革命和世界工

①田心铭《论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 and 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第18页。

②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1921年11月1日〔14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30页。

③王建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关问题新探讨》,《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第108页。

④唐振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毛泽东思想萌芽论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⑤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⑥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51页。

⑦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⑧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6页。

人运动的著作,然后到工人中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便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一个新的运动”^①。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在大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②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③。1920年始,毛泽东一直在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在找寻斗争中主要依靠的力量^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认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⑤领导工人阶级在大城市发动革命的屡次失败,更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如果在中国不发动农民参加革命,那么革命是不会成功的。1927年8月,毛泽东在出席中国共产党湖南省会议讨论秋收暴动时指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⑥后来,他在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⑦。到农村去,因为农民具有坚决的革命性;到农村去,因为那里有无产阶级最可靠的“革命同盟军”;到农村去,中国革命从此就走上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事实证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找到的这条革命道路是无比正确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⑧。

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农民阶级的重视程度是他们不可比拟的,所以就有学者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⑨。最先将毛泽东同民粹主义相关联的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他认为,毛泽东早年说过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而且在一个农业国家,“人民”这一概念几乎就等同于农民,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从城市走向了农村,去与农民为伍了,这就表明毛泽东思想中早就充斥着民粹主义思想^⑩。而这一观点也影响了一部分国内学者。例如,胡绳也认为毛泽东早年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⑪,但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而且他认为毛泽东是我党旗帜鲜明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⑫。因为毛泽东过于重视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判定他是民粹主义者或者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学术争论主要发生在20多年前,近年来也一直有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多数学者同意了毛泽东早年的思想中可能存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篇带有民粹主义的调查报告^⑬。但笔者认为,毛泽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虽然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了解或接触过当时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想(思潮),但这并不能判定他就染上过这种思想的色彩。在一个农耕文化色彩十分厚重的国家中,仅凭其重视农民就将其同民粹主义相关联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再者,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并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中华民族的诉求和目的同民粹主义是毫无关联的。毛泽东认识到需要依靠而且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去干革命,是因为他看到了教条式遵循马列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现实相结合,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对农民阶级认知的转变。毛泽

①黎澍《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第3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第4页。

③毛泽东《反动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④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⑤欧阳湘、罗玲《毛泽东在广州》,第11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20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218页。

⑧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

⑨武文超《国外有关毛泽东思想之传统文化溯源研究综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16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页。

⑩〔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7页。

⑪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页。

⑫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5页。

⑬〔美〕布兰特利·沃马克《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都静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32页。

东提出依靠农民不仅是革命的手段而且也是革命的目的,他希望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毛泽东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始终把农民阶级视为最坚固的依靠力量。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①习近平也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②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再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初步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再后来经过《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农村中的“工农武装割据”实践中萌芽了。莫里斯·迈斯纳也认为,毛泽东及其思想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在农村铸成的^③。经过多年的实践探寻和理论研究找到的这条革命新道路,就是让农民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充分地将全体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毛泽东最终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实现工农联盟思想的现实条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丰实了中国革命道路走向最终胜利的依靠力量。

(三)使对农民问题的持续关注有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社会运动发展时曾指出:“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④但纵观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哪一次从根本上改变过这个社会,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这之前,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知识分子瞧不起农民,“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⑤。20世纪早期,在试图从改造农村开始以挽救中国的乡建实验中,无论是梁漱溟领导开展的“乡村建设”,还是晏阳初领导实施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都没能在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上彻底改变农民、农村的面貌。惟有毛泽东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才为农民翻身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毛泽东在分析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主要内容的思想,并从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出发,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和策略……最终废除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使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使全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⑥中国共产党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征程,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毛泽东在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上讲道:“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⑦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阶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说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希望,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⑧,所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使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探索。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作了大量的探索和思考,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农村建设思想”^⑩。在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说道:“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这是我国的

①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第4—5页。

③[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第21页。

④毛泽东《致李鼎铭》(1944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⑥孙海林《毛泽东“三农”思想概论》,《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54—55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165页。

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7—1078页。

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⑩付春《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5期,第36页。

基本国情,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重要的依靠力量,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①无论是充当革命时期的同盟军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依靠力量,党中央对农民阶级的认识理论都源自于毛泽东的农民思想,而这些思想都与毛泽东早年对农民阶级的认知转变密切相关。

当下,新时代乡村建设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如今,以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不仅是中国主动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舱石,更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在开展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彰显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换言之,就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了解农民真正缺什么,需要什么。因此,应当“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③。同时他也要求,“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④。尊重农民主体性地位、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得到的宝贵经验,而毛泽东对于农民阶级认知的转变则对这些经验的形成及对当前农民问题的持续关注赋予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四 结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探寻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还让农民阶级从此成为了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各阶段中工人阶级最为可靠的同盟军。当下,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已然成了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毫无疑问,越是在接近民族复兴目标的紧要关头,越是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眼下,乡村建设行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以毛泽东科学把握和认识农民阶级的方法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为依据,在充分看到农民群体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农民集体意识,激发农民主体性意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正确路径。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更好实施,美丽乡村才会早日实现。

[责任编辑:何毅]

①温家宝《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02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9页。

②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页。

③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④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1页。